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53 期
2015 年 6 月，頁 43-82
DOI: 10.6243/BHR.2015.053.043

唆魯禾帖尼生卒年壽及其相涉史事*

許正弘**

摘要

拖雷正妻唆魯禾帖尼是蒙元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其人其事受到近代學者的關注。不過，她的生卒年壽史料星散而有疑，特別是生年及其年壽問題，相關論著不曾解決，只能付之闕如，頗俟探究。本文首先依據《元史》與波斯文文獻直接而明確的記載，確定她卒於 1252 年正月。其次輯釋卒年相涉史事四則，包括「命取金銀」、「清算政敵」、「接見竇默」與「奉安甘州」，提出疑義，試作考辨與疏通。最後著重討論有關生年的兩條材料，推定她生於 1199 年。從確定的卒年與推定的生年可知，唆魯禾帖尼享年五十四歲。生卒年壽既定，重新審視她的生平事跡，年歲因素值得納入考量。

關鍵詞：唆魯禾帖尼、《元史》、《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竇默、顏天翼、影堂

---

* 本文撰改期間，先後榮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02 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與科技部 103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助，謹此申謝。文稿初成，惠承業師洪金富先生，以及張帆與劉曉二位教授指教，受益匪淺，特致謝忱。又曾忝列歷史所三十周年所慶發表論文之一，宣讀於「103 學年度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學生論文發表會」（新竹，2015 年 5 月 2 日），承蒙洪麗珠博士評論，以及會中李卓穎教授與姜照中同學提出改進意見。今復得兩位匿名審查委員與編輯委員會惠賜若干寶貴建議，減少錯誤，強化論點，至為感謝。最後，誠願以此小文，勉為呈獻的一瓣心香，紀念蕭啟慶老師的七十八歲冥誕與逝世二周年又半。此前諸篇習作幸蒙老師提點，哲人其萎，今後再也無法親聆教益，哀何如哉。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一、引言

唆魯禾帖尼（Sorqaγtani），[1]克烈（Kereyit）部長王罕弟札阿紺孛（Ja'a Gambu）之女，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Tolui, 1192-1232）正妻，[2]景教（Nestorianism）徒。她在 1232 年拖雷死後，堅持守寡教子，積累政治資本，將近二十年之後（1251 年），終於扶助長子蒙哥（Möngke, 1209-1259）取得汗位。大蒙古國汗統從而自窩闊台家族轉至拖雷家族。生育四子，蒙哥之外，次子忽必烈（Qubilai, 1215-1294）繼任蒙古大汗，三子旭烈兀（Hülegü, 1218-1265）創建伊利汗國，幼子阿里不哥（Ariq-böke, ?-1266）亦且一度稱汗，可謂四汗之母，實乃「改變歷史發展方向的一個關鍵人物」。[3]由於才德賢能與地位崇高，她的事跡不僅見載當時中外語文文獻，或有專記，或見涉及；更且擁有諸多尊號，例如突厥－蒙古語的「別吉」（Begi，異譯 Beki「別乞」），[4]蒙古語

1　另有唆兒忽黑塔尼、唆魯和帖尼、唆魯古唐或莎兒合黑塔泥等異譯。四庫館臣改譯「纍勒噶塔納」（Saugha-tana），並釋「纍勒噶」之意為「桶」，塔納為「大珠」。這是由於語音訛誤所致的穿鑿附會。事實上，Sorqaγ 意為身上有胎記，-tani 則是陰性人名後綴。見陳得芝，〈蒙元史研究中的歷史語言學問題〉，收入陳得芝，《蒙元史與中華多元文化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285。此外，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認為唆魯禾帖尼又有「別魯迭」（Berüde）的別名。按「別魯迭」一詞，原見於《蒙古秘史》續集第2卷第272節，由於缺失旁注漢譯，諸家釋義紛紜。羅依果別名說外，有認為是突厥語的「情緒、情調、性格」之意，有認為是「直到生命結束」之意，有認為是「對於所有人」之意，莫衷一是。見烏蘭，〈關於《元朝秘史》旁譯缺失的詞匯〉，收入聶鴻音、孫伯君編，《中國多文字時代的歷史文獻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384-385。羅依果所謂別名，大致根據蒙古族婦女不只一名的風俗，惜未開展論述。

2　拖雷卒於 1232 年，《元史》本傳記其「壽四十有□」，闕文使得學界對於其生年有不同推論。一說 1192 年，見白壽彝總主編，陳得芝主編，《中國通史》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下冊，頁 2 注 1。一說生於 1186 至 1190 年間，見Igor de Rachewiltz,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eiden; Boston: Brill, 2006), p. 670. 茲從 1192 年之說。

3　洪金富，〈唐妃娘娘阿吉剌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臺北，2008.3），頁44-45。

4　別乞與別吉二詞指涉對象原本有別，別乞多指大巫師，別吉常指公主或皇后。見方齡貴，〈關於《吊琵琶》劇中的蒙古語〉，《雲南教育學院學報》，13：4（昆明，1997.8），頁68-69。有學者將別吉作為基督教婦女常用名 Beatrice 或 Bertha 的音

的「賽因額客」（Sayin eke，意爲好母親，藏文作Za-yin e-ka），西藏語的「吉祥天母」（dpal-ldan-lha-mo），波斯語的「阿吉剌」（ʻaqīlat，意爲聰明能幹、出類拔萃），等等。[5]元代漢文史籍多因其謚號習稱「莊聖太后」，[6]另有「唐妃」與「四王妃」等稱謂。其人其事更且受到當今學者的關注，專文探討和略涉評述，不一而足，研究成果豐碩，後來者幾乎難以再有重大突破。[7]不過，她的生卒年壽史料星散而有疑，特別是生年及其年壽問題，相關論著不曾解決，只能付之闕如，頗俟探究。本文擬就知見文獻，對有關問題作一初步探索，論證不當之處，誠盼指正。

二、卒逝年月考定

唆魯禾帖尼卒於1252年，學界已有共識，主要依據是《元史・憲宗紀》二年壬子（1252）春正月條「皇太后崩」四字。這是正確的。2008年，洪金富發表〈唐妃娘娘阿吉剌考〉，文末附有〈唐妃娘娘卒日小考〉，檢討《元史》相關記載，更將卒日確

譯，恐誤。又，波伊勒（J. A. Boyle）認為別吉稱號可能是為避免提到唆魯禾帖尼真名的一種死後謚號。見波斯・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據波伊勒英譯本翻譯），頁305。在此略為說明本文對於波斯文文獻──《世界征服者史》與《史集》二書的引用情形。筆者不識波斯文，本文所用《世界征服者史》係以J.A. Boyle英譯本的何高濟漢文轉譯本為據，《史集》則以俄譯本的余大鈞、周建奇漢文轉譯本為本，其第二卷部分另參J.A. Boyle英譯本的周良霄漢文轉譯本。諸漢文轉譯本所據都是目前較好較全的波斯文譯本，而漢譯者均是蒙元史研究者，其譯本或經翁獨健校訂，或有邵循正譯稿可參，譯文足以信據，尤其周良霄轉譯本更有許多極具意義的補注。筆者無法覆核俄譯本，但凡引用英譯本的漢文轉譯本，都已回查，如有疑問，另行注記。

5 明代蒙古汗族稱唆魯禾帖尼為「也失哈屯」（Eši qatun），意為「始初母后」。見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頁348-349。

6 《元史・太宗紀》逕以「太后」稱之，容易誤導讀者以為是太宗的母后，辨見洪金富，〈元代文獻攷釋與歷史研究──稱謂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4（臺北，2010.12），頁743-748。

7 劉光義，〈記蒙古莊聖皇后莎兒合黑塔泥事〉，《出版月刊》，2：1（臺北，1966），頁57-59；M. Rossabi, “Khubilai Khan and the Women in His Family,” in Wolfgang Bauer ed., *Studia Sino-Mongolica* (Weisbaden: Franz Steiner, 1979), pp. 153-180；劉靜貞，〈蒙古帝國汗位帝系移轉過程中的三位女性──脫列哥那、莎兒合黑塔泥、海迷失〉，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二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183-202；洪金富，〈唐妃娘娘阿吉剌考〉，頁41-62。另有以其人為題的若干論著，茲不贅列。

定爲憲宗二年壬子春正月二十日（1252.3.2）。[8]《元史・憲宗紀》所記確鑿無疑，可再從以下兩個方面補充說明。

首先是可能間接得到忽必烈的背書。蒙古汗廷從哈剌和林（Qara-qorum）遷到大都，加上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的爭戰，原始檔案散佚，早期和林汗廷的記載十分貧乏，勢必會使得官修《元史》中太宗、定宗、憲宗三朝本紀的質量低劣。[9]元廷所編《憲宗實錄》作爲《元史・憲宗紀》的史源，史料闕如的限制之外，採訪付錄的過程也不順利，名爲實錄，實爲事跡簡編。[10]至元二十五年（1288）進讀祖宗實錄，忽必烈所下評語是：「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11]忽必烈自己就是憲宗朝（1251-1259）史事的知情見證人之一，這些爲數不多的記事之中，他應該不會連自己母親升天的年月都無法記憶。忽必烈曾經目睹或耳聞的《憲宗實錄》，連同其他各朝實錄都已亡佚，胥賴《元史》編纂者輾轉過錄，化爲諸帝〈本紀〉。如無誤植，應可信據。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可以得到波斯文文獻直接而有力的印證。唆魯禾帖尼，《元史・后妃傳》有傳，僅二百六十三字，多載追尊謚號與謚冊文字，不記身世、事跡與年壽等生平基本資料，內容貧乏。[12]這是《元史・后妃傳》的通病。蒙元時代兩部波斯文蒙古通史——志費尼（‘Ata-Malik Juvaini, 1226?-1283）《世界征服者史》（*Ta’rikh-I jahan gusha*, 未成書，記事止於 1260 年前

8　洪金富，〈唐妃娘娘阿吉剌考〉，頁53-55。

9　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著，李文君譯，〈脫列哥那合敦是窩闊台的“六皇后”嗎？〉，《蒙古學信息》，2003：1（呼和浩特：2003.3），頁22。

10　除「或多失於記載」的客觀條件，太宗等朝《實錄》，更反映世祖的主觀意圖。見王慎榮等主編，《元史探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頁36-40。

11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15，〈世祖紀十二〉，頁309。《憲宗實錄》連同太宗與世祖等朝實錄，曾經譯為畏兀字蒙古文，而於成宗元貞二年進呈，並於大德七年完成最後修訂。見姚大力，〈“成吉思汗”，還是“成吉思合罕” ——兼論《元朝秘史》的成書年代問題〉，收入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214-215。

12　據《元史》載，大德十年正月，成宗有旨「詢訪莊聖皇后、昭睿順聖皇后、徽仁裕聖皇后儀範中外之政，以備紀錄。」見明・宋濂等，《元史》，卷21，〈成宗紀四〉，頁467。在唆魯禾帖尼死後五十四年詢訪事跡，所得有限，應在意中。

後）與拉施特（Rashid al-Din Tabib, 1247-1318）《史集》（*Jami'al-tawarikh*, 1311 年成書）的記述，就遠較《元史》詳細而精彩，可爲補闕。[13]《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兩度隨行入朝蒙古宮廷，1252 至 1253 年間更曾到訪大蒙古國國都哈剌和林，並開始撰寫是書。他主要根據來自於耳聞目睹，時人記時事，史料價值極高。《史集》的編纂較《世界征服者史》晚了五十餘年，記述可謂後出轉精。編者貴爲伊利汗國宰相，奉命修史，具備極其優越而豐富的史料來源：既有《世界征服者史》等成書可據，又能查閱汗國宮廷內的檔案文卷，直接或間接利用禁止外傳的《黃金冊》內容，更有包括元朝來使官員等蒙古人的協助。[14]這兩本書雖然未載唆魯禾帖尼的生年與年壽，卻都提及逝世日期，《世界征服者史》云：「她這樣繼續做下去，最後在 649 年祖勒希扎月（1252 年 2-3 月），快樂的毀滅者發出了死亡的通牒。」[15]《史集》相應記述云：「她遵循此道而行，直到伊斯蘭教曆 649 年 12 月（公元 1252 年 2 月 14 日至 3 月 13 日）去世爲止。」[16]志費尼當時正在和林，對於大蒙古國國母逝世的大消息，必定有所聽聞，繫時相當明確而可信。拉施特著錄此事，或許另有參考資料，但更明顯是「滿足於幾乎逐字逐句地追隨他的前輩」，[17]僅僅略作文字修飾，使得敘述更爲精確，完全信任志費尼作爲見證者的資格。唆魯禾帖尼卒於 1252 年春正月，[18]既經中外史籍明載的互證，至此應無可疑。這將是以下論證卒年有關史事疑問的重要依據。

---

13 洪金富，〈唐妃娘娘阿吉剌考〉，頁53。

14 何高濟，〈志費尼和《世界征服者史》〉，收入何高濟、陸峻嶺著，《域外集──元史、中外關係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147-150；劉迎勝，〈元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波斯史籍〉，收入劉迎勝，《蒙元帝國與13-15世紀的世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頁335-337。

15 波斯．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頁657。

16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頁236。

17 波斯．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英譯者序》，頁28。

18 本文所用月份，如非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又無括注或說明者，概指舊曆而言，尚請注意。

三、卒年相涉史事輯考

唆魯禾帖尼在蒙哥謀繼大汗期間，運籌帷幄，十分活躍。漢文載籍對此可以提供的信息無多，波斯文文獻《世界征服者史》與《史集》卻見詳載。她在蒙哥登上大汗寶座之後，直至逝世之前，亦即 1251 年六月到隔年正月的半年之間，中外史籍所載事跡闕略，不是語焉不詳，就是訛誤難解，甚至可能是發生在其已卒之後。[19]以下鉤稽所知唆魯禾帖尼卒年相涉史事四則，各自出於僅此一見的「獨家」記述，彌足珍貴，但卻頗見疑義，有待考辨與疏理。

（一）命取金銀

忽必烈即位之後推行中統鈔法，以金銀爲本位，以本至而降新鈔爲原則，罷廢各地舊有銀鈔。這在真定路推行時遇到難題。據《元史・布魯海牙傳》載：

> 世祖即位，擇信臣宣撫十道，命布魯海牙使真定。……中統鈔法行，以金銀為本，本至，乃降新鈔。時莊聖太后已命取真定金銀，由是真定無本，鈔不可得。布魯海牙遣幕僚邢澤往謂平章王文統曰：「昔奉太后旨，金銀悉送至上京，……又太后之取金帛，以賞推戴之功也，其為本不亦大乎！」文統不能奪，立降鈔五千錠，民賴以便。[20]

所謂「時莊聖太后已命取真定金銀」與「又太后之取金帛，以賞推戴之功也」二句，既在世祖推行中統鈔法之後，容易讓讀者以爲唆魯禾帖尼於中統年間（1260-1264）仍然在世，並且命取真定金銀賞賜忽必烈從龍功臣。李則芬認爲「此時莊聖已死多年，當

---

[19]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可能與蒙古人死後禁提其名的風俗有關。魯布魯克於1253年12月27日到達蒙哥營地，隔年8月18日離開哈剌和林，正在唆魯禾帖尼死後一二年之內，以致忌提其名，鮮有記述。見 Peter Jackson trans.,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 1253-1255*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90), p. 223, n. 4.

[20] 明・宋濂等，《元史》，卷125，頁3071。

係世祖的察必皇后之誤」，[21]即以唆魯禾帖尼的卒年爲據，推斷史文訛誤。這個看法恐將另滋疑義。按世祖皇后察必（Čabi, ？-1281），卒後追謚爲「昭睿順聖皇后」，並未封贈太后。《史集》認爲太后是「合罕之母」察必的尊號，[22]應是不諳漢式稱號傳統的誤解。察必子真金（Jingim, 1243-1286）既未即位「合罕」，漢文載籍也未見稱察必爲太后者。依照李氏之說，上引文中的「莊聖」應爲「順聖」之誤，三見「太后」都爲「皇后」之訛。史文錯訛如此，不免難以置信。真定爲唆魯禾帖尼分地，[23]布魯海牙（Buyruq Qaya, 1197-1265）爲唆魯禾帖尼家臣，察必命令布魯海牙取送真定金銀，同樣不可思議。

事實上，屠寄（1865-1921）早已注意並試著解決這個問題。他的《蒙兀兒史記》有布魯海牙附傳，指出《元史・布魯海牙傳》「時莊聖太后已命取真定金銀」云云，「有似中統初始命取者然，殊誤」，因而改寫作「真定爲莎兒合黑塔泥可敦湯沐地。在官金銀，蒙格汗登極初，已奉可敦命取去。」又將《元史》「又太后之取金帛，以賞推戴之功也」一句，改作「又太后之取金帛，以賞推戴先帝功也」，小注說明補入「先帝」二字的用意，希望避免讀者誤認是中統初年賞賜忽必烈的諸王百官。[24]屠寄補正十分確當，可惜點校本《元史》未能吸納，據以校改。[25]校改上述之誤，似也不必大費周章。在「時莊聖太后已命取真定金銀」之「時」字，或於其後出校勘記說明，或於其前補一「昔」或「曩」字，讓人明白是在追述往事，疑義就可冰消。史文既經

---

21 李則芬，《元史新講》（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9），第5冊，頁8。

22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頁 283。

23 唆魯禾帖尼卒後，真定封地為阿里不哥承繼，參孟繁清，〈唆魯禾帖尼中原漢地食邑考述〉，收入孟繁清等著，《蒙元時期環渤海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3），頁306-325。

24 清・屠寄，《蒙兀兒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94），卷79，〈廉希憲傳〉，頁1b-2a。

25 《元史・布魯海牙傳》記布魯海牙授為真定路達魯花赤，事在辛卯（1231）年前。這同樣有著年代記述上的誤失。真定路在1236年成為唆魯禾帖尼食邑前，不太可能派任達魯花赤，見白壽彝總主編，陳得芝主編，《中國通史》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下冊，頁228注1。

疏通，從而可知蒙哥即位之際，唆魯禾帖尼有旨盡取食邑真定所藏金銀，豪施重賞牢固人心，可謂費盡籠絡之能事。至於中統鈔在真定沒有鈔本可據而須朝廷撥款，則為後話。

（二）清算政敵

蒙哥歷經兩次忽里勒臺（khuriltai）的選舉，正式得到宗親確認為汗，並在 1251 年六月舉行登基儀式。落選的窩闊台系汗位候選人失烈門（Širemün）和腦忽（Naqu）二王，聯合察合台系宗王，公開宣布將會前往參加蒙哥的即位慶典，名義上給予祝賀與表示臣服，實際上圖謀刺殺新任大汗。刺殺行動因事前洩露導致失敗，蒙哥藉以展開全面而血腥的清洗，羅織株連，削弱窩闊台系和察合台系宗王的勢力。[26]

唆魯禾帖尼在蒙哥即位之前，對於窩闊台系和察合台系宗王恩威並濟，「以為也許能用仁慈籠絡他們，使他們從傲慢的夢中清醒過來」。[27]然而，在蒙哥即位之後的這場清算政敵行動，她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屠寄提出這樣的解答：「汗母莎兒合黑塔泥可敦以汗新即位，宜崇寬大之政，且事關至親，不便興大獄，緩解其事。明年，莎兒合黑塔泥殂。既葬，車駕還和林，乃追問前事。」[28]屠氏沒有引示根據，無法分辨是否純屬個人意見。劉靜貞就認為屠寄的「推論」不盡正確，特別從「海迷失被執送莎兒合黑塔泥斡耳朵受審這點」立說，認為「蒙哥沒有理由放縱自己的大敵，唯一能解釋的就是此時蒙哥已經掌握全局，始敢對海迷失下手」。[29]劉氏所謂「執送莎兒合黑塔泥斡耳朵受審」，根據的是《世界征服者史》與《史集》的記載。為方便討論與對照計，引

26　傅海波（Herbert Frank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編，史衛民等中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907-136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458-459；陸峻嶺、何高濟，〈從窩闊台到蒙哥的蒙古宮廷鬥爭〉，收入何高濟、陸峻嶺著，《域外集──元史、中外關係史論叢》，頁 21-25；劉迎勝，《察合台汗國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11-125。

27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頁241。

28　清．屠寄，《蒙兀兒史記》，卷19，〈后妃傳．古余克汗海迷失三可敦〉，頁6a。

29　劉靜貞，〈蒙古帝國汗位帝系移轉過程中的三位女性──脫列哥那、莎兒合黑塔泥、海迷失〉，頁193。

錄表列二書相關文字如下：

《世界征服者史》	《史集》
最後來的是海迷失哈敦：她和失烈門之母哈答合赤一道被送往別吉的斡耳朵。忙哥撒兒趕到那裡去，因這些女人的兒子們承認是陰謀的策畫者，她們在受到審問和坦白了她們的罪行後因她們的行為而受刑。[30]	當她來了以後，她和失烈門的母親合答合赤哈敦〔一起〕被送到唆兒忽黑塔尼-別吉的帳殿裡，忙哥撒兒札魯忽赤把她全身剝光，拖到法庭上審訊。……審問了她的罪行之後，她就被裹入毡中，拋進了水裡。[31]

二書同記斡兀立海迷失（Oγul Qaimiš, r. 1248-1251, d. 1252）與失烈門母親二人，的確是被送到唆魯禾帖尼的斡耳朵（ordo，即帳殿）受審，審訊結束隨即行刑，用毡毯包覆拋入水中。海迷失二人或因具有皇族遺孀的身分，特地被送到大汗之母的斡耳朵審鞫，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既無法看出唆魯禾帖尼是否參與，也不清楚審判的明確日期。[32]《元史・憲宗紀》對此事有相應著錄，十分簡略：「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禳事覺，並賜死。」[33]除了補充說明賜死罪名，[34]重要的是賦予明確年月，亦即將此事繫於憲宗二年（1252）的夏天（六月）之下。這個繫時應該是可靠的。蒙哥即位的大聚會從 1251 年六月開始，斷斷續續延至隔年的夏天，由於成思吉汗曾有規定皇族罪行須經宗親會審始得懲處，海迷失與失烈門母親應是在 1252 年大聚會結束前被命賜死。[35]既然唆魯禾帖尼在 1252 年正月已先逝世，自然無法參與這場在她斡耳朵舉行

---

30 波斯・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頁692。

31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頁254-255。

32 《中國通史》為唆魯禾帖尼立有專傳，傳文記蒙哥即位之後，認為唆魯禾帖尼「此後，她為鞏固汗位，毫不留情地鎮壓反對者，親自下令處死了斡兀立海迷失。」由於沒有引注出處，不知是否另有所據？見白壽彝總主編，陳得芝主編，《中國通史》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下冊，頁13。

33 明・宋濂等，《元史》，卷3，頁45。

34 厭禳的罪名，另可參照魯布魯克（William of Rubruk）所記：「蒙哥親口告訴我說，海迷失是最壞的巫婆，她用她的巫術毀了她的全家。」見美・柔克義譯注，何高濟中譯，《魯布魯克東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310。

35 魏曙光，〈阿兒渾覲見蒙哥之旅〉，《西北民族研究》，2011：3（蘭州：2011.9），頁208-209。

的審判。[36]至於所謂唆魯禾帖尼的斡耳朵，或許就在她的夏營地阿勒台（按台山，Altai，今阿爾泰山）。[37]

唆魯禾帖尼與蒙哥清算政敵行動完全無關？這也不盡然。據《世界征服者史》載，在蒙哥即位之前，海迷失等人遣使前往爭取畏兀兒亦都護（idi-qut，恩兀兒首領稱號）的支持，計畫滅絕別失八里（Beš-baliq）及其鄰近的穆斯林（muslim，伊斯蘭教徒），並裝備一支五萬人的軍隊，以應不時之需。奉命前往的使者是八剌（Bala）。他是畏兀人，太宗朝三位主要必闍赤（bičēči，主行文書者）之一，窩闊台家族的重臣。[38]亦都護被八剌說服之後，爲了執行這個計畫，以朝見海迷失爲名，駐營郊外，開始集結畏兀兒軍隊。不久，蒙哥登基的消息傳來，亦都護放棄原先計畫，準備動身入朝。然而，仍然有人揭露亦都護和海迷失之間的密謀，於是亦都護被逮送回別失八里執行死刑，八剌則是「當謀逆者受審，而且因此受刑時，就在這個密謀泄露前，他已給囚禁起來，失去活命的希望。現在，他跟別的一些人給押到郊外，剝光衣服等候正法。但是，別吉因爲生病，病勢嚴重，爲她的長壽而施慈恩，就赦免那天本當處死的人。故八剌也刀下逃生。」[39]唆魯禾帖尼重病，爲了祈福延壽，特別赦免八剌在內的死囚。這應該是出於蒙哥的旨意，而非來自唆魯禾帖尼的干涉。巴托爾德（V. V. Bartold, 1869-1930）曾記此事，有「再有兩位官員，其一因莎兒合黑帖尼出面關說被赦免」云云，[40]雖未明指其

36　《多桑蒙古史》似已注意到時序的問題，並試著予以疏理。該書先敘1252年2月唆魯禾帖尼之死，再述同年8月蒙哥至哈剌和林究訊諸王及后妃之獄，包括海迷失逮繫至唆魯禾帖尼帳定罪處死之事。敘事時序清晰，應是參酌《元史》與波斯文文獻。多桑著，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245-246。

37　韓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收入韓儒林，《穹廬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408。

38　劉迎勝，〈阿剌脫忽剌兀忽里臺大會考〉，收入劉迎勝，《蒙元帝國與13-15世紀的世界》，頁13-14。

39　波斯．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頁58。

40　巴托爾德著，張錫彤、張廣達譯，《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下冊，頁553。

人，但應指八剌，所謂「出面關說」，恐非事實。

亦都護企圖殺盡伊斯蘭教徒，未必真有其事，卻提供蒙哥整肅口實，藉以達到消除窩闊台家族在畏兀兒地區勢力的目的。[41]八剌參與此事的前因後果，可說是志費尼的「獨家」報導，但是對於受刑獲赦的確切時間沒有明文，[42]而是籠統說是「這些事發生在650/1252-3年」。[43]這可能是道聽塗說的傳聞，於是含糊其詞，時日不免無法準確。《世界征服者史》另在書中他處簡略提到此事，[44]《史集》也見扼要著錄，[45]但既沒有對八剌其人有所著墨，日期也不甚清楚。[46]其中，《史集》提到一個年月──伊斯蘭教曆「650年9月」，相當於公元1252年11月5日至12月4日。然而，這個年月的歸屬有疑：據俄譯本應是亦都護密謀的開始，[47]據英譯本則是鎮海（Činqai, ca. 1169-1252）被處決的日期。[48]亦都護的密謀，已如前述，早在蒙哥即位之前就已進行，因此應以英譯本爲是，俄譯本致誤的原因不詳。比讀《世界征服者史》與《史集》對於蒙哥即位清算政敵的記述，後書主要取源自前書，但也有補充、剪裁與調整。鎮海的到來與處死，《世界征服者史》放在海迷失受審之前，《史集》則移置其後，顯然是有意改動之一例。《史集》將亦都護密謀置於處決鎮海之後，放在這一小節的最

---

41 《多桑蒙古史》明白指出亦都護「信奉佛教，殆因此而為人所謀陷也」，但卻不提八剌奉命之事。見多桑著，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頁247。另參羅賢佑，〈元代畏兀兒亦都護譜系及其地位變遷〉，《民族研究》，1997：2（北京：1997.4），頁73；劉迎勝，《察合台汗國史研究》，頁135。

42 前引文的「現在，他跟別的一些人給押到郊外」云云，所謂「現在」自然無法令人得悉所指。

43 《世界征服者史》沒有最後定稿與成書，著重語言修飾與使用譬喻，全書結構顯得不夠嚴謹，敘述不免前後重複以至於自相矛盾，日期也易有錯誤。見何高濟，〈志費尼和《世界征服者史》〉，頁147-150。

44 波斯．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頁692-693。

45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頁255。

46 虞集應制撰寫〈高昌王世勳碑〉，詳述畏兀兒亦都護世系，但未記此事，顯然是有意的隱瞞，《世界征服者史》與《史集》的記述仍是彌足珍貴。見劉迎勝，《察合台汗國史研究》，頁138。

47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頁255。

48 波斯．剌失德丁原著，波義耳英譯，周良霄譯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247。

末，沒有明確時日，或許也是對《世界征服者史》繫時的困惑而無其他材料足據的關係吧。無論如何，八剌獲赦，應該在蒙哥即位到隔年唆魯禾帖尼逝世之間，據《世界征服者史》提供的籠統繫時，可能就在 1252 年年初。唆魯禾帖尼在這段時期生了一場重病，「病勢嚴重」，病癒與否，史闕有間。這場重病使得她無法主動介入蒙哥對於政敵的清算，也使得文獻上逐漸失去她的蹤影，甚至最後因而離開人世。

（三）接見竇默

〈竇默神道碑〉，全稱〈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竇公神道碑〉，由王磐（1202-1293）撰文、胡祗遹（1227-1295）書丹與商挺（1209-1288）篆額，至元二十五年（1288）立石。碑石至今幸存河北肥鄉，是研究碑主竇默（1196-1280）生平與元初歷史的重要文獻和珍貴文物。據碑載，竇默於己酉歲（1249）應忽必烈之聘，後云：

> 壬子歲冬，上命公往詣曲你河拜見太后，賜之貂帽、貂裘、靴襪稱是。既至，太后問：「汝為何等人？」公以「孔夫子門弟子」為對。乃命之坐，賜之酒食，顧遇之禮甚厚。[49]

壬子歲爲憲宗二年（1252），「上」爲忽必烈，「太后」則是唆魯禾帖尼，俱出後人追記。這是一段可貴也可疑的記錄。可貴的是，元代其他文獻未見相關記述，竇默今存另外兩份主要傳記資料—〈墓誌〉相應處已略作「壬子冬，賜以貂尾裘帽」，[50]《元史》本傳更是隻字未及。[51]〈竇默神道碑〉可以修飾，但難虛造，

---

[49] 任乃宏曾對神道碑文進行文獻與碑石的核校，茲據其錄文，但標點稍有不同。見任乃宏，〈《竇默神道碑》輯錄匯校〉，《文物春秋》，2011：5（石家莊：2011.10），頁72-77（引文見頁76）。

[50] 竇默〈墓誌〉，李謙撰，已佚，幸賴《元朝名臣事略》引存之。此處引文見元．蘇天爵輯撰，姚景安點校，《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8，〈內翰竇文正公〉，頁152。

[51] 明．宋濂等，《元史》，卷158，〈竇默傳〉，頁3730。

想必別有所本。可疑的是，唆魯禾帖尼既於壬子年（1252）正月辭世，豈能在冬天接見竇默而留下這樣的對話記錄呢？2003 年，孟繁清發表〈唆魯禾帖尼中原漢地食邑考述〉，針對史文與碑文的矛盾，認爲「《竇公神道碑》或《太宗紀》（引者按：應是《憲宗紀》）的時間記載或許有誤」，[52]但未論定。事實上，此前已有兩位學者也注意到這個矛盾。1993 年，陳學霖撰寫竇默英文傳記，將之解釋爲「1252 年冬天，竇默謁見忽必烈母唆魯禾帖尼，就在她死前不久」，[53]試圖調和文獻記載的齟齬，卻難讓人釋疑。1995 年，陳高華發表〈論竇默〉一文，認爲「波斯史家志費尼記載，唆魯禾帖尼死於1252年2月至3月。現據上述漢文記載，志費尼的說法是值得懷疑的。」[54]根據〈神道碑〉文質疑《世界征服者史》的記載，似以後者有誤，惜乎點到爲止，未再推闡。筆者認爲唆魯禾帖尼接見竇默的「壬子冬」是「辛亥冬」之誤，亦即在1251年冬天，理由有四，說明如次。

首先，前已確定唆魯禾帖尼卒逝年月是在 1252 年正月（二十日），除非出現其他可據的直接記載，否則不宜輕易推翻。質言之，竇默不可能在壬子年（1252）的冬天晉謁唆魯禾帖尼。按雙方會見的前一記事是竇默向忽必烈舉薦姚樞（1203-1280），〈神道碑〉、〈墓誌〉與《元史》本傳都有記述，但年月具未見載。姚樞應聘年代可以考知，殆有二說：一據〈姚樞神道碑〉爲庚戌年（1250），[55]一據《考歲略》爲辛亥年（1251）。[56]〈姚樞神道碑〉爲其侄姚燧（1238-1313）撰文，伯侄關係又甚緊密，記事日

---

52 孟繁清，〈唆魯禾帖尼中原漢地食邑考述〉，頁313-314。

53 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Hsiao Ch'i -ch'ing and Peter W. Geier eds.,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üan Period (1200-130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3), p. 409. 原文參照如次：In winter 1252, Tou had an audience with Qubilai's mother Sorqaqtani Beki, shortly before her death.

54 此文後收入陳高華，《元史研究新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頁184-202，引文見頁195。

55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校，《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歲庚戌，……。明年，憲宗即位。」（頁216-217）

56 元．許衡著，淮建利、陳朝雲點校，《許衡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卷 13，〈附錄後．考歲略〉：「辛亥，雪齋（引者按：即姚樞號）赴徵」（頁316）。

期或更可信。無論如何，這次會見只能在庚戌年或辛亥年的冬天。

其次，竇默既奉忽必烈之命往詣曲你河，又受賜貂帽、貂裘與靴襪等禦寒衣物，[57]榮寵之外，似有值得推敲的餘地。一種可能的解讀是忽必烈將讓竇默前往較遠的北方之地。曲你河，元代相關史籍僅此一見其名，方位地望，頗待考定。[58]唆魯禾帖尼既在曲你河住冬，應當先從她爲今人習知的冬營地開始考察。拖雷家族的漠北封地主要有二：一是拖雷繼承的蒙古本土，從斡難（Onon River, 今鄂嫩河）與怯綠連（Kelüren River, 今克魯倫河）兩河的上游直到按台山（今阿爾泰山）之地。二是唆魯禾帖尼在窩闊台汗時期（1229-1241）獲得的吉利吉思（Qirqiz）與謙謙州（Kem-Kemčiḥüd），亦即元人通稱的「別吉大營盤」。[59]她的夏冬營地，可以根據《史集》記阿里不哥所繼承者推知：「夏營在 Ulīās tū，而冬營在兀良哈惕和吉利吉思，兩地相距三日程」，[60]政治中心可能是在吉利吉思部長的舊營地。[61]作爲冬營地的吉利吉思和謙謙州相鄰，「這兩個地區構成一個地域。謙謙州是一條大河」。[62]這條大河就是謙河（今葉尼塞河上游），是由八河彙聚而成。八

---

57 據〈竇默神道碑〉載，賜予這些物品的似為唆魯禾帖尼，但其下有「既至」云云，卻又說明應是在謁見太后之前所得。據〈墓誌〉載，應是忽必烈所賜。

58 《畿輔通志》錄有〈竇默神道碑〉，其中將「曲你河」改譯「齊諾河」。見清．李衛等修，田易等纂，《畿輔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藝文．碑〉，頁3a。齊諾，四庫館臣以之為蒙古語，意為狼。此處改譯的根據不明。

59 陳得芝，〈元嶺北行省建置考（上）〉，收入陳得芝，《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135。關於吉利吉思與謙謙州，另見韓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頁388-436；周清澍，〈元朝對唐努烏梁海及其周圍地區的統治〉，收入周清澍，《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頁290-313。

60 俄譯本與英譯本《史集》記述頗見出入，茲據韓儒林譯文。分見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頁365；波斯．剌失德丁原著，波義耳英譯，周良霄譯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頁385；韓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頁408。韓氏亦已考訂夏營地應在 Altai（阿勒台）山。

61 韓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頁407。

62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245。

河之名，《史集》有所詳列，[63]法國漢學家韓百詩（Louis Hambis, 1906-1978）曾撰〈謙河考〉討論其中河名的問題。從《史集》所列河名及韓百詩的考訂，無法尋得能與曲你河勘同者。[64]值得注意的，四季營地只是一個大致的範圍，游牧部眾並不侷限定居一處。[65]董文用（1224-1297）於 1250 年就在和林城謁見過唆魯禾帖尼。[66]由於元代譯音的「泥母」（n）與「流母」（l）常相混同，有學者認爲曲你河即怯綠連河，是在拖雷家族的蒙古草原東部分地之內。[67]這是有可能的。無論如何，曲你河極有可能位於唆魯禾帖尼謙謙州的冬營地，至少是在漠北地區，應無疑問。

竇默應召進入忽必烈潛邸後，「燕見晤語無時，不令暫去左右」。[68]他奉命往拜太后，應是從忽必烈的駐地出發。陳得芝詳考忽必烈1253年前後行跡，明確指出：1252年或至少1251年冬天以

---

63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頁192-193。

64 韓百詩著，耿升譯，〈謙河考〉，《蒙古學信息》，1991：1（呼和浩特：1991.3），頁 9-10。值得注意的，該文另對玉須（Ijus）水進行詳考，辨正《元史．地理志六．西北地附錄》所謂「謙河經其中，西北流。……東北有水曰玉須」之誤，認為該水應在西北，「是指白玉須河和黑玉須河兩條河，它們匯合之後就形成了我們西方地圖中的 Tschulym 河，它是鄂畢河的右部分支」（頁 15）。這條「西方地圖」的丘雷姆（Tschulym）河，一譯楚累姆河，似可與曲你河勘同。據《成吉思汗的繼承者》載，阿里不哥兵敗於忽必烈後，駐師在謙謙州之玉須河邊過冬，並遣使求宥。說明此處作為冬營地的可能。見波斯．剌失德丁原著，波義耳英譯，周良霄譯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頁297。俄譯本「玉須」河未見譯出，漢譯者有注引述英譯本文字。邵循正則將玉須譯作「答剌速（Daras）」，並有按語疑即忽必烈第九子闊闊出條下之Darsū。分見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頁298；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紀》譯釋（上）〉，收入邵循正，《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頁41。不過，丘雷姆其名的起源仍待探究。

65 邱軼皓，〈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13-14世紀）──漢文、波斯文史料之對讀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頁70注333。

66 明．宋濂等，《元史》，卷148，〈董文用傳〉，頁3495。

67 邱軼皓，〈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13-14世紀）〉，頁38。來母與泥母在漢語方言中時相混讀，元代他種語言的漢語譯名有不少以L譯寫R，或是L與N互換的例子。見陳得芝，〈在紀念亦鄰真教授逝世十周年會上的發言〉，《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4（北京，2010.8），頁21。此外，《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卷》有「怯綠連河」詞條（陳得芝執筆），列舉該河諸異譯，未見曲你河。見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卷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頁329。

68 任乃宏，〈《竇默神道碑》輯錄匯校〉，頁76。

前，忽必烈仍在漠北，之後方始移營漠南。[69]前已述及，壬子應爲庚戌或辛亥之誤。庚戌年（1250）冬，竇默與忽必烈既然都在漠北，特賜衣物，似無必要。辛亥年（1251）冬，竇默可能已經隨同南下爪忽都（Jaqut），受命北覲太后，路途既遠，天寒地凍，賜予衣物應在情理之中。

再次，孟繁清認爲竇默奉忽必烈之命往謁其母，應該不如神道碑文所言，只爲向太后推薦一名孔門弟子，而是要推薦一位能爲太后治病的醫生，可惜神道碑對此略而不談。[70]陳高華已經明白揭示現存各種竇默傳記資料，大都強調他以理學家的身份得到特殊的禮遇，但他實因針術高明應聘，在忽必烈藩邸中主要是治病保健的醫生。竇默的〈神道碑〉與〈墓誌〉，均出儒臣之手，著意突出他的理學色彩。[71]竇默如果確是奉命前來治病，不免引人懸想前文提到唆魯禾帖尼的那場重病，應在辛亥年的冬天。這次醫治罔效，神道碑（或碑文所據行狀）隱諱不書，遺漏最重要的情節，徒留令後人沒有頭緒的對話，疑非無故。

最後，會見後一記事爲受忽必烈之命教授真金。〈竇默神道碑〉云：「時皇太子未冠，上命公教之。上將往征大理，以玉帶鈎賜公，且曰：『此金內府物也，汝老人，被服爲宜。太子見我所賜物，如見我矣。』公留數年，請南還。」[72]〈墓誌〉記述大同小異，[73]《元史》本傳則作：「俄命皇子真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鈎，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爲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74]先說明一個用詞不夠精確的小問題。〈神道碑〉與〈墓誌〉所謂「時皇太子未冠」，「未冠」概指未滿二十歲，衡諸真金生年（1243），此年（1252）不過十

69　陳得芝，〈八思巴初會忽必烈年代考〉，收入陳得芝，《蒙元史研究叢稿》，頁329。關於忽必烈漠北封地，參李治安，〈元世祖忽必烈草原領地考〉，收入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369-383。

70　孟繁清，〈唆魯禾帖尼中原漢地食邑考述〉，頁314。

71　陳高華，〈論竇默〉，頁192-194、199。

72　任乃宏，〈《竇默神道碑》輯錄匯校〉，頁76。

73　元．蘇天爵輯撰，姚景安點校，《元朝名臣事略》，卷8，〈內翰竇文正公〉，頁152。

74　明．宋濂等，《元史》，卷158，〈竇默傳〉，頁3730-3731。

歲左右，約莫幼學之齡，距離弱冠猶遠。此外，既在往謁太后之後，「時」字容易讓人聯繫前文，以爲是同在「壬子歲冬」，太子真金與太后唆魯禾帖尼同在「曲你河」。這也是有問題的。竇默成爲真金的老師，主要是代理姚樞原先的教職，〈姚樞神道碑〉有相應的記述：「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明年夏，禡牙六盤，……。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75]析言之，竇默教導真金，是在「師行」之後，亦即忽必烈軍隊離開六盤山向南進發臨洮，時爲癸丑年八月。[76]王恂（1235-1281）被薦召至六盤山，受命輔導而爲真金之伴讀，同在此年，應該也是用來「彌補」姚樞離開後的空闕。[77]真金隨同父母駐屯六盤山，[78]仍然受教姚樞，直到大軍南下而被留置後方，亦即忽必烈在爪忽都的營地。隨同真金返回爪忽都住冬者，除竇默之外，另有太醫大使顏飛卿（1191-1254）、曲陽劉禪師與羅天益等漢地名醫。有學者認爲「忽必烈出征以後，太后和真金都居住在爪忽都之地，身邊有眾多名醫照料他們的生活」，或謂「數名漢地名醫相聚於瓜（爪）忽都之地，估計與太后病重及隨即去世有些關係」。[79]事實上，從駐師六盤山到住冬爪忽都的這段期間，唆魯禾帖尼不僅早已離世，真金更不曾到過漠北的曲你河。太后與太子在當時時空背景的限制之下，恐怕是無法共處一地的。

（四）奉安甘州

《元史・順帝紀》元統三年三月丙申（十四日，1335.4.7）條

---

75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校，《姚燧集》，〈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頁218-219。

76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紀一〉，頁59；元・程鉅夫著，張文澍校點，《程鉅夫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卷5，〈平雲南碑〉，頁56。

77 明・宋濂等，《元史》，卷164，〈王恂傳〉，頁3844。

78 忽必烈駐軍六盤山之際，真金母察必也隨侍在側。察必不僅在此接受八思巴灌頂，進而調解並促成忽必烈對八思巴的尊崇。見西藏・阿旺貢噶索南著，陳慶英、高禾福、周潤年譯注，《薩迦世系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頁106-110。

79 分見陳高華，〈羅天益與《衛生寶鑑》〉，收入陳高華，《陳高華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276；孟繁清，〈唆魯禾帖尼中原漢地食邑考述〉，頁314。

下記事，有云：「中書省臣言：『甘肅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別吉太后於內，請定祭禮』，從之。」[80]這仍是一條不見於元代其他文獻的獨家記載。別吉太后，既是「世祖皇帝母」，應是唆魯禾帖尼無疑。茲事前因後果已難明瞭，語焉不詳，令人生疑：唆魯禾帖尼爲何「奉安」在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什麼？何時「奉安」？爲何在此時提出訂定祭禮的請求？這些問題沒有其他材料可供參證，原本都將成爲歷史上的未解之謎，卻在四百四十年後忽然有了解答。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修纂歷時七年的《甘州府志》告竣，隔年雕版刊印。該書有兩則相關記事，一爲卷二〈世紀・下〉記元明史事，其中「順帝至元元年」條云：「春三月，定甘州路十字寺祭別吉太后禮。別吉太后，世祖皇帝母也。初，世祖定甘州，太后與在軍中，后沒，世祖使於十字寺祀之。至是，歲久祀事不肅，故議定之，其禮未詳。」[81]一爲卷十六〈雜纂〉記死於甘州的皇后妃子，也有簡略描寫：「元至元元年，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母別吉太后於內，定祭禮。蓋太后亦在甘殂者。」[82]這兩則記事說明唆魯禾帖尼在甘州過世，由忽必烈選定十字寺奉祀，祀事日弛，順帝於是重定祭禮。不過，十字寺奉祀的是唆魯禾帖尼的遺體、御容或神主，沒有明確交代。《甘州府志》刊印的一百七十餘年後，民國三十八年（1949）新修《張掖縣志》，進一步推衍而有〈元世祖太后墓〉之說。[83]

馬曉林於 2014 年發表〈元代甘州十字寺唆魯禾帖尼影堂設立原因探析〉一文（以下行文省稱〈唆魯禾帖尼影堂〉），專就該影堂成立緣由進行詳盡考察，頗有闡發，值得重視。他首先明確指出：《甘州府志》沒有提供比《元史》更多的可靠訊息，所作

80　明・宋濂等，《元史》，卷38，〈順帝紀一〉，頁826。元統三年十一月改元至元，《元史》逕繫於至元元年之下，後世文獻與論著多沿之。

81　清・鍾賡起編著，張志純、郭興聖、何成才校注，《甘州府志校注》（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7），卷2，頁41。

82　清・鍾賡起編著，張志純、郭興聖、何成才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16，頁850。

83　白冊候原纂，余炳元續纂，《民國新修張掖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中國地方志集成》據民國油印本影印），頁346。

增補只是對於《元史》的一種解讀，並無證據支持，不足爲憑。[84]筆者完全同意這個看法。《甘州府志》的史料來源是個有趣的問題。據該書卷二〈世紀・下〉序言載：「元入正統，貴戚分藩，漸登風雅，而史中凌雜鹽米，或近駢枝。《明史》所記，時與傳聞牴牾。參互考訂，芟其繁蕪，質其訛謬，而二代之跡，於是乎寄焉」，[85]清楚說明該卷史源來自正史與傳聞的互證。至於卷十六〈雜纂〉更是「羅列見聞，零星匯記」而成。[86]陶保廉（1862-1938）在1891年隨侍乃父往新疆赴任，記述沿途見聞，撰成《辛卯侍行記》一書。《辛卯侍行記》不是一部單純的游記，而是一部「稽考精湛」的史地名作。[87]陶氏途經張掖，特別提及城內西南隅的宏仁寺，不僅辨正《甘州府志》所記宏仁寺賜名之誤，更指出致誤根由竟是「僧人妄言，修志者妄聽之耳。」[88]陶保廉所謂妄言妄聽的根據，今已無從驗證，但對《甘州府志》的記載，應該存有幾分戒心，考而後定，特別是史無明文者。前揭疑義，張志純等校注《甘州府志》，試圖彌縫，認爲「世祖定甘州」，是指憲宗元年忽必受命領治漠南民戶，「奉母離開漠北，路經甘州，於翌年正月太后病故於甘州十字寺」。[89]這和《民國新修張掖縣志》的太后墓，俱都闕乏史料佐證，難以憑信。唆魯禾帖尼卒逝地點，未見史載，但如前述，她逝世之前生了重病，忽必烈派遣竇默前往醫治，住地始終都在漠北，可能就在作爲冬營地的謙州境內，死後歸葬漠北的蒙元皇室墓地。[90]

---

84 馬曉林，〈元代甘州十字寺唆魯禾帖尼影堂設立原因探析──兼論馬可・波羅所記河西景教〉，《國際漢學研究通訊》，8（北京，2014.3），頁196。

85 清・鍾賡起編著，張志純、郭興聖、何成才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2，頁31。

86 清・鍾賡起編著，張志純、郭興聖、何成才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首，〈甘州府志凡例〉，頁43。

87 賈建飛，〈陶保廉與西北邊疆問題研究──以《辛卯侍行記》為中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北京，2010.6），頁122-128。

88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養樹山房刻本影印），卷4，十月二十三日條，頁42a。

89 清・鍾賡起編著，張志純、郭興聖、何成才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2，頁41注2。

90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頁365-366。此一葬地所在的相關討論，詳參陳得芝，〈成吉思汗墓葬所在與蒙古早期歷史地理〉，收入

甘州十字寺既非唆魯禾帖尼安葬之地，奉安在此者，應該是她的御容。[91]換言之，甘州十字寺是她的一座影堂。她的影堂，除甘州十字寺外，另有大都也里可溫寺與真定玉華宮，共有三座。其中，玉華宮是道教宮觀，由拖雷夫婦共同享祀，其他二座應是景教寺院，都由唆魯禾帖尼單獨受祀。[92]這座甘州十字寺影堂僅見載於《元史・順帝紀》，《甘州府志》等清朝或民國纂修的方志又不可盡據，欲加詳定，顯有難能。〈唆魯禾帖尼影堂〉別闢蹊徑，從怯烈部與西夏、拖雷與河西以及河西的景教等三個方面切入，推測唆魯禾帖尼十字寺影堂的設立者和緣由，認爲「有可能是甘州的官員、景教徒發起設立，然後再向朝廷請命，初設的時間可能比較晚。」[93]論說旁徵博引，持之有故，足以令人信服，但或許仍有再作討論的餘地。

一，馬曉林認爲《元史・順帝紀》無法證明甘州路十字寺祭祀是世祖忽必烈設立，「如果忽必烈便已設立祭祀，爲何遲至順帝時才定祭禮，於理不通。」[94]《元史》所謂「請定祭禮」云云，確實曖昧其詞，無法判斷始設祭禮的時間。究竟後至元元年（元統三年）是「始定」或是「重定」祭典？馬氏所謂「遲至順帝時才定祭禮」，顯然是從「始定」一義所做的解釋。有無可能從「重定」一義立說呢？《元史・順帝紀》有條記載，或許有助解決這個問題。《元史・順帝紀》，至元三年十二月壬午（十六日，1338.1.7）條，有云：「集賢大學士羊歸等言：『太上皇、唐妃影堂在真定玉華宮，每年宜於正月二十日致祭。』從之。」[95]太上皇、唐妃指的是拖雷夫婦。這條〈紀〉文容易讓人解讀爲真定

陳得芝，《蒙元史與中華多元文化論集》，頁 155-182。

91　唆魯禾帖尼是景教徒，是否允許後人描繪形像並加供祀，已難徵知。參見許正弘，〈試論元代原廟的宗教體系與管理機關〉，《蒙藏季刊》，19：3（臺北，2010.9），頁63-64。

92　元代影堂，又稱原廟或神御殿，詳參洪金富，〈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臺北，2008.3），頁1-40；許正弘，〈試論元代原廟的宗教體系與管理機關〉，頁54-78。

93　馬曉林，〈元代甘州十字寺唆魯禾帖尼影堂設立原因探析〉，頁210。

94　馬曉林，〈元代甘州十字寺唆魯禾帖尼影堂設立原因探析〉，頁208。

95　明・宋濂等，《元史》，卷39，〈順帝紀二〉，頁842-843。

玉華宮拖雷夫婦影堂祀典，直至後至元三年方始確定祭時，開始祭祀。事實並非如此。玉華宮及其內拖雷夫婦影堂（孝思殿）都在世祖時期蓋建，[96]並「以忌日享祀太上皇、皇太后御容」。[97]忌日奉祀拖雷夫婦，或在九月（拖雷忌日），或在正月（唆魯禾帖尼忌日），有許多文獻可以爲證，決非始自順帝至元三年。羊歸何以此時提出建議，真正原因已難詳考，洪金富認爲「玉華宮神御殿正月之祭可能有變。或者日期更動，或者不再舉行」，[98]亦即後至元三年應是「重定」而非「始定」祀典。甘州十字寺的情形恐怕也是如此。順帝至元元年與三年接受臣下進言，分別重定唆魯禾帖尼兩座影堂的祀典，應有其故，值得深究。[99]此前在元統二年，中書省臣進言佛事布施的費用太廣，請求「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餘皆罷」，[100]同樣獲得順帝的許可。減罷佛事布施相應舉措，《元史・順帝紀》沒有下文，不得而知，[101]唆魯禾帖尼兩座影堂重定祭禮，可能就與之有關。

二，〈唆魯禾帖尼影堂〉舉河南鈞州拖雷影堂和四川蟠龍山蒙哥影堂爲例，認爲唆魯禾帖尼甘州十字寺的影堂「最初並不是出於朝廷的決定，而是當地官員、耆老、景教徒發起創設的。」[102]按鈞州拖雷影堂是由王惲（1227-1304）提議營建，應是他在河

---

96 真定玉華宮的特殊之處，見洪金富，〈忽必烈乳母的不揭之謎〉，《古今論衡》，21（臺北，2010.12），頁31-62。

97 明・宋濂等，《元史》，卷75，〈祭祀志四・神御殿〉，頁1876。

98 洪金富，〈唐妃娘娘阿吉剌考〉，頁54-55。

99 日本學者岡田英弘認為此事與三年前安西王月魯帖木兒被殺有關，進而指出甘州係屬安西王轄下，基督教徒原在六盤山的安西王帳中奉祀唆魯禾帖尼靈位，就將靈位移至甘州的基督教堂。見岡田英弘著，薄音湖譯，〈達延汗六萬戶的起源〉，《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85：2（呼和浩特，1985），頁11。這是不合史實的假說。事實上，月魯帖木兒被殺與否，尚有疑義，而甘州是甘肅行省治所，並非安西王該管領地。關於甘肅行省建置沿革，見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450-501。

100 明・宋濂等，《元史》，卷39，〈順帝紀二〉，頁821-822。

101 劉迎勝指出《至正條格》所記元統二年收還田產事件，應是減罷佛事布施的具體舉措之一。見劉迎勝，〈元統二年收田事件研究──國家與貴族、寺院爭奪土地的背後〉，收入劉迎勝，《蒙元史考論》（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頁427-483。其說似有進一步探究的餘地，容俟他日撰文論之。

102 馬曉林，〈元代甘州十字寺唆魯禾帖尼影堂設立原因探析〉，頁211。

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的任上，可能是在至元十五年秋至十六年秋之間。[103]蟠龍山蒙哥影堂是宜賓縣尹楊濟亨倡議修造，經由以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出使四川的王守誠（1296-1349）採錄上報朝廷，時間則在至正五年（1345）左右。這兩座影堂建造與運作情形不詳，但在建造之前，顯然必須報請許可，恰恰正是「出於朝廷的決定」。甘州十字寺應該不會也不能是例外，畢竟不向朝廷申報而私自奉祀帝后是難以想像的。[104]〈唆魯禾帖尼影堂〉又指出：「河南鈞州設睿宗廟距拖雷去世已數十年，四川蟠龍山設憲宗神御殿距蒙哥去世已近百年。這種時間上的滯後，更加表明這些影堂並非朝廷創設。」這兩座影堂都是向元廷報請，已可說是由朝廷創設。另外，元代自忽必烈開始採行漢地原廟制度，[105]鈞州睿宗影堂在世祖朝倡建，時間上並無「滯後」的問題，也與是否爲朝廷創設無涉。至於四川蟠龍山的憲宗神御殿同有疑義，詳見下述。

三，甘州十字寺作爲唆魯禾帖尼的影堂，〈唆魯禾帖尼影堂〉提出兩個可能的緣由：一是基於唆魯禾帖尼與河西的某種淵源，一是甘州入元以後地位的提升與當地景教的發展。[106]這都是

---

[103] 王惲提議事狀見收於《秋澗先生大全集》卷92。王曉欣認為《秋澗先生大全集》卷91與92大致寫於至元二十年以後，見元．趙承禧等編撰，王曉欣點校，《憲臺通紀（外三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點校說明〉，頁10。然而未多申論，恐怕不盡正確。北京大學張帆教授於2014年6月30日來信惠賜寶貴意見，節錄要旨如下：《秋澗先生大全集》卷91與92兩卷事狀撰寫年代不一，也未依時序排列。根據卷90〈便民三十一事〉題下有注「自此皆監司時建白」，應當包括王惲前後四次擔任「監司」所上事狀。從而可以大體斷言王惲提議營建鈞州拖雷影堂，應在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任上，時間上限為至元十五年秋，下限為至元十六年秋。茲遵其說，並申謝悃。

[104] 武宗伯忽篤皇后出資創建順聖寺奉祀答己太后神御，就須「以告中書，庶幾上聞而有所屬也」，並得勅賜碑記以明「締築非瀆」。見元．許有壬，《至正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據清宣統3年（1911）聊城鄒氏石印藏鈔本影印），卷46，〈勅賜順聖寺碑〉，頁59b-61a。

[105] 以下有關元代原廟的敘述而未另出注者，詳見拙著，〈試論元代原廟的宗教體系與管理機關〉，頁54-78。

[106] 馬曉林，〈元代甘州十字寺唆魯禾帖尼影堂設立原因探析〉，頁210。值得注意的，馬可．波羅對元代河西地區景教留下較為全面的記述，馬曉林文中亦見討論，從中無法看出當地景教與唆魯禾帖尼之間的關連。

言之成理的推論，但與元代地方影堂建置的原則恐有未合。有元一代的影堂寺觀可考者約有二十四座，絕大部分集中於大都地區，大都之外確知奉祀御容的寺觀只有三座：集慶的龍翔集慶寺、趙城的廣勝寺與真定的玉華宮。另有四座供祀情形不明或有疑者，包括鈞州拖雷影堂，蟠龍山蒙哥影堂，晉王甘麻剌（Gamala, 1263-1302）在成吉思汗（Činggis Qan, 1206-1227）諸大斡耳朵附近所建寺院，以及甘州十字寺。元人元永貞曾進奏議，反對真定玉華宮使用太常禮樂，提到：「今玉華宮原廟，列在郡國，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主者以臣僕之賤，供奉御容，非禮之甚。」[107]析言之，都城以外的地方（郡國）設置影堂，選址應該以起家與誕生之地爲原則。這也就是王惲所謂的「王業所基，戰勝龍興之地」，[108]可說是宋代以來的成規。[109]龍興與降誕的「標準」可以有所伸縮，至少與受祀者應有密切關係。檢視上列大都之外確知或有疑的七座寺觀影堂，有五座大致都能符合：集慶爲元文宗潛邸，趙城和真定分別是忽必烈與拖雷家族的分地（真定可說是龍興之地），[110]鈞州是拖雷親自征服的「戰勝龍興之地」，成吉思汗諸大斡耳朵則是蒙古皇室重要與神聖的根基。[111]最有疑問的是蟠龍山蒙哥與甘州十字寺唆魯禾帖尼二座影堂。蟠龍山蒙哥影堂可疑之處有三：其一是蒙哥攻打四川受阻，更且在此亡逝，似乎都和蟠龍山（在今四川閬中境內）沒有關係，適合的紀念場所應是與卒逝相關的釣魚山（在今重慶合川境內）或金

---

107 陳得芝、邱樹森、何兆吉輯點，《元代奏議集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下冊，〈真定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頁137。

108 洪金富點校，《元代臺憲文書匯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頁390。

109 兩宋在西京、南京地區與外路州郡寺院都設有帝后神御殿，詳見汪聖鐸，〈宋代西南二京的帝后神御殿〉，收入張其凡、陸勇強主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322-333；同氏，〈宋代寓於寺院的帝后神御〉，收入姜錫東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5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頁241-264。

110 山西趙城、浮山、洪洞地區可能是忽必烈家族所屬分地，見邱軼皓，〈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13-14世紀）〉，頁103-107。

111 陳得芝，〈成吉思汗墓葬所在與蒙古早期歷史地理〉，頁161。

劍山（在今重慶璧山境內）。[112]其二，蟠龍山位處夔州，宜賓縣隸屬敘州路，楊濟亨越俎代庖，動機不明。其三，元代沒有爲大蒙古國諸汗特建原廟，太祖、太宗與睿宗三朝御容合祀於翰林國史院，拖雷另同唆魯禾帖尼奉祀於真定玉華宮，定宗與憲宗始終未聞受祀。楊濟亨在蒙哥卒後九十餘年「突然」有此倡議，竟然獲得許可，實在令人生疑。[113]甘州同樣問題重重。該地既非唆魯禾帖尼或拖雷家族投下，即有淵源，關係卻不密切，爲何在此奉祀唆魯禾帖尼，恐難得到合理的解釋，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四，甘州十字寺的所在地點與所屬宗教也有問題。從十字寺名稱與唆魯禾帖尼的信仰而論，應爲景教寺院無疑。但據《甘州府志》載，甘州十字寺即俗名「大寺」的宏仁寺（今張掖大佛寺），西夏起建，明清重修，實乃一佛寺。明代重修留下的二碑，更是隻字不及元朝十字寺的情形。[114]近人對《甘州府志》的記載有不同的理解，大致可以歸納爲二說：第一是直辨其誤者，如《甘州府志》校注者云：「十字寺，《府志・地理・古迹》認爲大寺，非也。別吉太后爲景教徒，當住在甘州的景教（基督教）教堂。」[115]第二是調和其說者，認爲元朝皇室在佛寺添建景教建築而有十字寺之名，但景教建築僅爲佛寺大院的一個組成部份，因而十字寺不能等同大寺。明洪武五年（1372）兵燹，大寺被災，十字寺景教建築更遭全毀，以致清代修志者只能列爲古

---

112 嚴格來說，蒙哥是在前往縉雲山寺的休養營地途中，死於金劍山溫湯峽，時為1259年七月上旬。見陳世松，《蒙古定蜀史稿》（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頁77。而宋元軍隊在蟠龍山的爭鋒，元軍在此建城備禦，主要是在忽必烈即位之後，見明・宋濂等，《元史》，卷161，〈楊大淵傳〉，頁3777-3785。

113 憲宗神主於至元十七年就被遷出太廟，此後未再入祀，意謂斷絕蒙哥後裔繼位的可能性，強調忽必烈一系傳承的合法性。見馬曉林，〈元朝太廟演變考──以室次為中心〉，《歷史研究》，2013：5（北京，2013.10），頁73。楊濟亨倡建原廟，恐怕不無干犯大不韙之嫌。

114 拙著，〈試論元代原廟的宗教體系與管理機關〉，頁62-63。沙哈魯在1420年遣使至中國，使者造訪甘州大佛寺，所記完全不及元代十字寺或唆魯禾帖尼曾受供奉之事。見波斯・火者・蓋耶速丁著，何高濟譯，《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120-121。

115 清・鍾賡起編著，張志純、郭興聖、何成才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2，頁41注1。

跡。[116]兩種說法各有道理，卻都難以驗證。對於第二種說法，另一座奉祀唆魯禾帖尼的大都也里可溫寺之遭遇，或許可以作爲參考。有學者推測該寺在明初被人劏毀，並改建爲供奉真武的顯佑宮，毀壞程度相當徹底，完全沒有元代的遺跡遺物存留。這種破壞的方式，「是當時普遍實行的作法，這大概就是元代的遺跡遺物在北京城內保留甚少的原因了。」[117]甘州十字寺被毀，應該也是同樣的情形。不過，梵刹之中增建景教建築，只是一種臆測，仍然令人費解，不能無疑。

總而言之，甘州十字寺的唆魯禾帖尼影堂，在順帝以前即已建置奉安，順帝時期重定祭禮，都是出於元廷主導而非地方所能專擅。不過，十字寺設立唆魯禾帖尼影堂的緣由，以及十字寺地點與所屬宗教，疑點重重，難以通解。可能是十字寺所在的大佛寺，另有一個關於皇帝出身的神奇傳聞——元順帝（妥懽貼睦爾，1320-1370，1333-1370 在位）是瀛國公（南宋恭帝，1271-1323，1274-1276 在位）之子，引起清代以後諸多傑出史學家考據真僞的論爭。開創此一傳聞的《庚申外史》，將元明宗（1300-1329，1329 在位）向瀛國公求子的地方，說是「甘州山寺」，被認爲就是大佛寺。周清澍已有辨正，指出此一傳說純屬編造，其中有兩個明顯的「破綻」：一個是順帝生母出身問題，一個是地理位置不對。地理位置的問題是元明宗與瀛國公兩人當時都離甘州甚遠，絕無可能會面。[118]王頲試予疏通，其中對地理問題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甘州」是「謙州」之訛，兩地讀音相近致誤。[119]這是仍待檢證卻值得重視的見解。「甘州」十字寺是否也是「謙州」之誤？《元史・順帝紀》所記「甘肅甘州路十字寺」，言之鑿鑿，不太可能只是音近致誤。然而，從前文提到的甘州十字寺

---

116 吳正科，《大佛寺史探》（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頁38。

117 徐蘋芳，〈元大都也里可溫十字寺考〉，收入徐蘋芳，《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5），頁466。

118 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說所反映的天命觀〉，收入周清澍，《元蒙史札》，頁508-509。

119 王頲，〈合尊龍爪——南宋少帝遇害與元順帝身世傳奇〉，收入王頲，《西域南海史地考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339-342。

種種疑義，卻也不免讓人有所聯想。「謙州」十字寺固然不見記載，難以求證，但謙州既是唆魯禾帖尼的分地，又可能是她的卒地，兼以當地素有信仰景教的傳統，[120]在此建寺奉祀，或許是一個不失合理的推測。

四、生年與年壽推考

唆魯禾帖尼事跡雖見諸中外史籍，但所記多在其夫拖雷死後，此前記事近乎闕如。學界對於她的卒年，已有大致共識，有如前述，但她的生年仍未論定，原因就在於有關記述無多。目前可知明確提及她年壽的材料只有兩條，記的是同一件事，都是醫病的紀錄。其一見於《元史・許國禎傳》，云：

> 世祖在潛邸，國禎以醫徵至翰海，留守掌醫藥。莊聖太后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迺張宴賜坐。太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鋌如年數賜之。[121]

從中能夠得知唆魯禾帖尼治病「當時」的年歲，但卻沒有明確繫時可供推算生年。周良霄曾經注意此條材料，措意於許國禎入侍時間，認爲「唆魯和帖尼生年不可能遲於 1190 年。以此推之，許國楨之入侍拖雷家族，當在 1243 年前。」[122]推斷的根據爲唆魯禾帖尼必定生在 1190 年之前，可惜未見引據與論證。許國禎應徵與爲太后治病，兩事的時間是否可以等同，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許國禎是忽必烈潛邸的漢人儒醫，頗受親任，仕至翰林集賢大學士（從二品）。他的傳記資料以《元史》本傳最爲完整，因無行狀、墓誌或神道碑存世，無從覆覈本傳史源。後世改編《元史》諸書，轉錄承襲，沒有增補新的資料。趙琦撰文補正《元

---

120 楊富學，〈古代柯爾克孜人的宗教信仰〉，《西北民族研究》，1997：1（蘭州，1997.6），頁135-136。另，《元史・地理志》有「或云汪罕始居於此地」云云，此地者，謙州也，容易讓人得出克烈部原居地在謙州的結論。陳得芝已辨其誤，見其〈十三世紀以前的克烈王國〉，收入陳得芝，《蒙元史研究叢稿》，頁211。

121 明・宋濂等，《元史》，卷168，〈許國禎傳〉，頁3962。

122 周良霄，《忽必烈》（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頁32注1。

史・許國禎傳》疏漏，指出許國禎被召的時間，「很可能是元太宗十年以後」，也就是在 1238 年後。[123]這可作爲唆魯禾帖尼接受醫治的年代上限。《元史・許國禎傳》在此事之後，又記「伯撒王妃病目」、「宗王請隸帳下」與「世祖過飲馬湩」三事，都無紀年可考，[124]直至再記隨同忽必烈從征雲南，方有「憲宗三年癸丑」（1253）的繫年可按。唆魯禾帖尼在憲宗三年以前已經卒逝，可以接受治療的下限應在 1252 年正月逝世之前。唆魯禾帖尼治病之事，目前只能暫時推斷在1238至1252年期間，時年五十三歲，逆推生年落在1186至1200年之間。

唆魯禾帖尼年壽的另一條材料見於〈顏天翼神道碑〉。顏天翼（1191-1254），字飛卿，原籍舞陽（治今河南舞陽）天福山。少繼家學，精通醫術，被蒙古軍所俘，1234 年隨軍北上，後爲蒙哥重要侍醫，特遷提點太醫院。《元史》無傳，幸賴《邢臺縣志》據李槃所撰〈顏天翼神道碑〉節文立傳，足見生平梗概。[125]〈顏天翼神道碑〉詳載碑主曾爲唆魯禾帖尼治病，茲將相關記述摘錄如下：

---

[123] 趙琦，〈《元史・許國禎傳》增補〉，《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6：1（呼和浩特，2004.1），頁30。

[124] 伯撒王妃，魏曙光明確指出就是忽必烈的乳母伯撒剌黑，甚是，但出注據以指出《史集》記載「拖雷汗由於唆兒忽帖尼別吉失明，落後了幾天，後來才來到成吉思汗處」之訛，認為失明的應是伯撒剌黑，恐誤。《元史》所記伯撒剌黑與《史集》所記唆魯禾帖尼兩人失明，時間不同：前事據周良霄與趙琦所考，應在 1238 乃至 1243 年以後；後事據《史集》所載，卻在 1225 年秋天。兩事明顯不可混同。見魏曙光，〈再論成吉思汗建國後的分封〉，《元史論叢》，14（天津，2014.1），頁129；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317。關於伯撒剌黑，詳見洪金富，〈忽必烈乳母的不揭之謎〉，頁31-62。另外，相應於《史集》所記唆魯禾帖尼失明，屠寄在其《蒙兀兒史記》同樣將之繫於 1225 年秋天，寫作：「是秋，成吉思征西夏。拖雷以妻莎兒合黑塔泥病痘，緩行數日，後追從之。」屠寄所據史源應是間接得自《史集》，但「病痘」與失明恐難等同，不詳改寫緣由。見清・屠寄，《蒙兀兒史記》，卷33，〈拖雷傳〉，頁1a。

[125] 李槃其人其文，見党寶海，〈李槃與劉秉忠文集〉，《元史論叢》，14，頁320-326。關於〈顏天翼神道碑〉，《全元文》未收，相關介述見孟繁清，〈蒙元時期的顏氏三碑〉，《中國史研究》，2009：3（北京：2009.8），頁168；同氏，〈內丘扁鵲廟的元代碑刻〉，收入方鐵、鄒建達主編，《中國蒙元史學術研討會暨方齡貴教授九十華誕慶祝會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頁121-122。

> 時憲宗在潛邸，素聞其名，因來朝奏請與俱還。及即位，以為太醫使。自是日侍左右。凡有事於諸神，降香嶽瀆，輒使代行。莊聖太后不豫，尚醫十三輩視之無功。召天翼，曰「法當下」，眾難之。直以身任下，果愈。后時壽五十三，每一（月）〔歲〕賜金五十兩，計得金共二千六百五十兩，悉以分十三人。后曰：「吾以賞汝，彼何功？」對曰：「藥雖臣用，議決眾人。」后嘉其讓，更賜金二百五十兩。[126]

對讀前揭《元史・許國禎傳》，兩條材料所記無疑爲一事，下筆著墨濃淡有別，治病功勞則各執一詞，甚至不及彼此名諱。〈顏天翼神道碑〉的敘述顯得更爲詳贍與生動，最重要的是，《元史・許國禎傳》不詳的醫治時間，在此明確被繫於蒙哥即位（1251）之後。唆魯禾帖尼在 1252 年正月逝世，接受治療當在1251年，時年五十三歲，據以推算應生於1199年。

以上推定的生年頗難置信，尤其據以衡諸唆魯禾帖尼生平：她在 1204 年與拖雷成婚，年方六歲（拖雷十三歲）；[127]五年後生

---

[126] 清・戚朝卿修，周祜纂，《邢臺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中國方志叢書》據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刊本影印），卷6，〈人物・列傳〉，頁25a。

[127] 拖雷和唆魯禾帖尼成婚時間的考定，見馬曉林，〈元代甘州十字寺唆魯禾帖尼影堂設立原因探析〉，頁197-198。大致可從，但仍有疑。據《史集》第二卷載，成吉思汗在拖雷「年幼時，就為他聘娶了客列亦惕部君主王汗的兄弟札阿-紺孛的一個女兒，唆兒忽黑塔尼別吉」（頁190）。拖雷十三歲成婚，以「年十五以上成丁」而言，稱為「年幼」（《成吉思汗的繼承者》作「童年」，見該書頁192），似有未當。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朮赤的身上。《史集》第二卷另記朮赤「當他年紀還很幼小，在少年時代之初，成吉思汗就為他聘娶了王汗的一個侄女，札阿紺孛的女兒尼克帖迷失旭真。她是成吉思汗之妻亦巴合別吉和拖雷汗之妻唆兒忽黑塔尼別吉的姊妹。」（頁114）《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相應處則作：「朮赤汗青年時娶扎合敢不 Jagambo 之女名別禿忒迷失兀真 Bek-Tutmïsh Fujin 為妻。彼為成吉思汗妻亦巴合別姬 Ibaqa Beki 與拖雷之妻唆魯和帖尼別姬之姐妹。」（頁126）所謂「青年時」，英譯本原文為 childhood and youth，或應譯作「在幼年與少年之間」。見John A. Boyle trans.,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99. 按札阿紺孛有三女嫁入成吉思汗及其二子，應該都在同時。成吉思汗為長子與幼子娶妻，不及察合台與窩闊台，原因不詳，影響暫且無論。當時朮赤生年不晚於1184年，1204年娶妻，已逾廿歲，「很幼小」與「少年時代之初」之說恐無著落。元代大致以十五歲作為兒童與成人的區分，見大島立子撰，烏蘭譯，〈12-14世紀蒙古人的年齡結構〉，《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4（北京，2010.8），頁99-

下長子蒙哥，僅僅十一歲，不免太幼；又六年再生次子忽必烈，也才十七歲。十一歲生子固然十分驚人，但不是絕無僅有，特別是考量當時仍處群雄並起的戰亂局勢，札阿紺孛被迫獻女，聘娶或生育都難合乎情理。[128]窩闊台汗時期的一則記載值得提請注意。窩闊台汗曾於 1237 年，爲了報復諸部訛言括取民女而擅自婚配，下令拘括七歲以上少女共四千人，「把那些異密之女和別的分開來，接著所有在場者奉命糟踏她們。其中兩個月兒般的少女斃命。至於剩下的純潔少女，他讓她們在斡耳朵前列隊，那些品貌堪充下陳的送往後宮」，其餘或作賞賜，或至妓院和使臣館舍侍候旅客，或由在場者帶走。[129]括取民女年齡下限竟以七歲爲準，當時所謂「早」婚，或許必須考量時代背景的特殊性。至於早生情事，時至今日仍然屢聞不鮮，更加令人難以想像。[130]

113。朮赤生年的推定，見白壽彝總主編，陳得芝主編，《中國通史》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上冊，頁351 注 1；Igor de Rachewiltz,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p. 410-411.

128 元代女子婚齡的討論，可參王曉清，《元代社會婚姻形態》（武漢：武漢出版社，2005），頁62-68。

129 波斯．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頁270-271。此事又見《元史》與《蒙古秘史》記載，所括民女諸部實為斡赤斤屬部，代表窩闊台汗與東道諸王之間開始出現矛盾。見邱軼皓，《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13-14世紀）》，頁55。

130 歷代后妃生子年齡，尤其早生紀錄較少見載，明確可稽者，例如清世祖孝康章皇后佟佳氏（1640-1663）於順治十一年（1654）三月生皇三子玄燁，當時虛齡不過十五。趙翼曾經注意童女生子的現象，指出《南史》所載張麗華十歲有娠，《輟耕錄》所載蘇達卿女十三歲生子，「皆事之絕奇者」。見清．趙翼著，欒保群、呂宗力校點，《陔餘叢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卷42，〈童女生子〉，頁769。若以女性通常較男性早熟而言，或許可以皇帝年歲作為參考。趙翼於另一部考史名著，又再指出魏齊諸帝有早婚與早生的現象，所列諸帝都在十五歲以下。見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15，〈魏齊諸帝皆早生子〉，頁316。另參李憑，《北魏平城時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197-200。清聖祖（1622-1722）十四歲（1667）生子承瑞，亦為顯例。這都是游牧民族王朝君王的例證。至於十一歲左右女子生育消息，今日仍時見報載。最極端的例子是秘魯的琳娜．梅迪納（Lina Vanessa Medina）。她是世界紀錄與醫學史上最年幼的母親，在1939年生下一名男嬰，當時年僅五歲又七個月。這個案例一度被視為騙局。參見網址：http://rumor. nownews.com/2010/07/08/515-2622983.htm（查詢時間：2015 年 6 月 20 日）中國最小生育年齡的紀錄，應是清宣統二年（1910），山西祁縣薛姓童養媳李福珍於八歲生下一子，並有照片為證。李福珍八歲生子，十歲又再生女，而其子直至 2000 年去世，享壽九十一歲。參見網址：http://tw.aboluowang.com/2011/

〈顏天翼神道碑〉係屬碑傳文字，其間難免記憶差誤或籠統含糊，致使時序倒亂，無法落實。然而，既無其他確證足以推翻，只能暫時採信根據碑文推導的結果，況且所記唆魯禾帖尼在 1251 年的這場大病，尚可得到以下三點印證：前文所考唆魯禾帖尼卒年相涉史事，提到她命人盡取真定金銀，雖是用來賞賜推戴蒙哥功臣，但也不免讓人懸揣許國禎與顏天翼等人治病有功的賞金（將近三千兩），可能也出自其中。此其一。唆魯禾帖尼卒年相涉史事之中的「清算政敵」與「接見竇默」二事，一是因「病勢嚴重」而特赦死囚，一是奉忽必烈之命前來醫治，都與蒙哥即位之後所生重病有關。〈顏天翼神道碑〉所記前後動用十四位醫生看治，[131]束手無策，病勢危殆，不言可喻，而竇默或許就是所謂「視之無功」的尚醫十三人之一。顏天翼與許國禎兩人爲唆魯禾帖尼治療，應該也是指同一場病。如果是不同的兩場重病，顏、許兩人作爲蒙哥與忽必烈重要的漢人侍醫，碑傳可以像竇默的神道碑般隱諱，不會完全沒有反映。至於顏、許兩人碑傳都提及唆魯禾帖尼大病得癒，疑是回護之詞。他們可能一度治癒收效，卻是迴光返照，終究回天乏術。他們的碑傳報喜不報憂，避重就輕，只記有功，不記最後結局。[132]此其二。〈顏天翼神道碑〉在碑主爲唆魯禾帖尼治病前之記事：「凡有事於諸神，降香嶽瀆，輒使代行。」蒙哥是蒙元第一個祭祀嶽瀆的大汗。他在即位當年的秋天就有命代祀，以李志常（1193-1256）爲使，而以近

1206/228625.html#sthash.lsVcHPlE.IogXCEd1.dpbs（查詢時間：2015 年 6 月 20 日）。

131 這個醫療團隊名單，除許國禎與顏天翼較為確定，竇默也是可能的醫者，餘則難考。許、顏與竇三人都是漢地名醫，可能尚有其他宗教人士的參與。例如蒙哥妃子闊台重病，既請偶像教僧侶驅魔，又請基督教與景教教士醫治。見美．柔克義譯注，何高濟中譯，《魯布魯克東行紀》，頁276-277。

132 唆魯禾帖尼回天乏術，或謂顏、許二人恐須承擔醫療責任，碑傳亦不應據以吹噓曾經治癒之功。茲舉一例以為釋疑。大德四年，闊闊真太后不安，曾命醫者宋超視疾。據程鉅夫為宋氏所撰先德碑載，太后「茹藥，尋差。賜衣鈔，改承事郎，掌醫署丞。」這顯然同樣是經過美化的說法。闊闊真的病不曾得到根除，當年二月竟而卒逝。在程鉅夫所撰碑文之中，依然只記治病有功而受賞陞官，隻字不提太后可能未久即死，以及碑主是否受到懲處。見元．程鉅夫著，張文澍校點，《程鉅夫集》，卷8，〈太原宋氏先德之碑〉，頁89；明．宋濂等，《元史》，卷20，〈成宗紀三〉，頁430。

侍哈力丹輔行。翌年夏天，遍祭嶽瀆之禮完成。[133]顏天翼可能也是代祀活動負責人之一。他奉命代行降香期間，適逢唆魯禾帖尼得病，未能繼續遍祭嶽瀆而被召回。原本日侍蒙哥左右的顏天翼，卻在十三位尚醫看診無效之後被召，應該是遠行難以速回的緣故。此其三。

五、結語

通觀全文，可以得出簡短的結語：唆魯禾帖尼卒年可以確定在1252年正月，生年則可推定在1199年，享年五十四歲。卒逝年月的考定，因有《元史》、《世界征服者史》與《史集》等中外史籍的明確記載互證，無庸置疑。卒年相涉史事與生年年壽的考辨，倚恃的基本資料大致可分三類：一是波斯文文獻的《世界征服者史》與《史集》，二是正史典籍的《元史》，三是碑誌史料的〈竇默神道碑〉和〈顏天翼神道碑〉。三類資料總共描寫五件史事，多屬獨家記述，記事目的各異，貌似毫無關連，但在反覆推敲之後，本文懷疑說的很可能都是環繞著同一件事：唆魯禾帖尼在蒙哥即位（1251）之後所生的一場大病。這場大病可說是唆魯禾帖尼生命終結之前的最後一件大事，然而闕乏完整記載，有關記述星散，間或存疑，都只能反映一個片面。本文逐一考辨釐清，試圖拼湊還原，其中不免推測，並對前人研究略有指摘，卻尚可姑備一說，以待將來確證之發見。

唆魯禾帖尼生卒年壽既定，史籍記載與近人論述的訛誤都得廓清，並得從年歲因素重新審視她的生平事跡，有助於增進對大蒙古國政治史的理解。她六歲就與拖雷成親，十一歲生下長子蒙哥，十七歲再生次子忽必烈。長子交由三伯窩闊台收養爲子，以往多從風俗習慣與政治動機進行解讀，當時年紀尚幼也是一個可能的因素。拖雷在蒙哥之後又由其他妃子產下二子，而正妻唆魯禾帖尼相隔六年才再舉子，也不能不予人以聯想。唆魯禾帖尼於

[133] 馬曉林，〈元代國家祭祀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頁289。

二十歲生下三子旭烈兀，後生四子阿里不哥，廿七歲一度失明，卅四歲於拖雷死後撐持門戶，開始登上政治舞臺。她婉拒讓小她七歲的侄子貴由（Güyüg, 1206-1248）收繼，堅持守寡將近二十年，終於「將國家這個新娘送到蒙哥合罕的懷抱中」。[134]甫登權力高峰，卻也漸從史書記載中消失。功成身退或另有其故，過去一直未能有合理的解釋。現在看來，應該就是重病纏身的影響。她在生病期間，無論贊成與否，自然無法介入蒙哥的清算政敵行動。雖曾接受竇默、許國禎與顏天翼等漢地名醫的治療，病況一度好轉，並從所取的真定金銀中撥賜賞金，終究不敵病魔而辭世。她應該是在謙謙州的住冬營地養病，病危不治之前，依俗移居外氈帳房，死後殯殮其中，[135]因而當地十字寺奉安肖像，作爲紀念。

[134]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頁236。
[135] 明．宋濂等，《元史》，卷77，〈祭祀志六．國俗舊禮〉，頁1925。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波斯．火者．蓋耶速丁著，何高濟譯，《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

白冊候原纂，余炳元續纂，《民國新修張掖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中國地方志集成》據民國油印本影印。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點校本。

波斯．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據波伊勒英譯本翻譯。

清．李衛等修，田易等纂，《畿輔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與第二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西藏．阿旺貢噶索南著，陳慶英、高禾福、周潤年譯注，《薩迦世系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波斯．剌失德丁原著，波義耳英譯，周良霄譯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校，《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美．柔克義譯注，何高濟中譯，《魯布魯克東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85。

洪金富點校，《元代臺憲文書匯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

清．屠寄，《蒙兀兒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94 六版。

清．戚朝卿修，周祜纂，《邢臺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中國方志叢書》據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刊本影印。

元．許有壬，《至正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據清宣統 3 年（1911）聊城鄒氏石印藏鈔本影印。

元．許衡著，淮建利、陳朝雲點校，《許衡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陳得芝、邱樹森、何兆吉輯點，《元代奏議集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社，1998。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養樹山房刻本影印。
元．程鉅夫著，張文澍校點，《程鉅夫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元．趙承禧等編撰，王曉欣點校，《憲臺通紀（外三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趙翼著，欒保群、呂宗力校點，《陔餘叢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清．鍾賡起編著，張志純、郭興聖、何成才校注，《甘州府志校注》，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7。
元．蘇天爵輯撰，姚景安點校，《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
Boyle, John A. trans. *Genghis Kha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Boyle, John A. trans.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Jackson, Peter trans.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 1253-1255*.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90.
Rachewiltz, Igor d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eiden; Boston: Brill, 2006.

二、近人專書

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卷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
巴托爾德著，張錫彤、張廣達譯，《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王慎榮等主編，《元史探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王曉清，《元代社會婚姻形態》，武漢：武漢出版社，2005。
白壽彝總主編，陳得芝主編，《中國通史》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多桑著，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吳正科，《大佛寺史探》，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北京：中華書局，2011。

李則芬，《元史新講》，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9。
李憑，《北魏平城時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周良霄，《忽必烈》，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陳世松，《蒙古定蜀史稿》，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傅海波（Herbert Frank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編，史衛民等中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907-136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劉迎勝，《察合台汗國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Rachewiltz, Igor de, Hok-lam Chan, Hsiao Ch'i -ch'ing and Peter W. Geier, eds.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üan Period (1200-130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3.

三、近人論文

大島立子撰，烏蘭譯，〈12-14 世紀蒙古人的年齡結構〉，《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4（北京，2010.8），頁 99-113。
方齡貴，〈關於《吊琵琶》劇中的蒙古語〉，《雲南教育學院學報》，13：4（昆明，1997.8），頁 66-69。
王頲，〈合尊龍爪──南宋少帝遇害與元順帝身世傳奇〉，收入王頲，《西域南海史地考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329-349。
任乃宏，〈《竇默神道碑》輯錄匯校〉，《文物春秋》，2011：5（石家莊，2011.10），頁 72-77。
何高濟，〈志費尼和《世界征服者史》〉，收入何高濟、陸峻嶺著，《域外集──元史、中外關係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147-158。
李治安，〈元世祖忽必烈草原領地考〉，收入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增訂本，頁 369-383。
汪聖鐸，〈宋代西南二京的帝后神御殿〉，收入張其凡、陸勇強主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 322-333。
汪聖鐸，〈宋代寓於寺院的帝后神御〉，收入姜錫東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 5 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頁 241-264。
邱軼皓，〈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13-14 世紀）──漢文、波斯文史料之對讀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周清澍，〈元朝對唐努烏梁海及其周圍地區的統治〉，收入周清澍，《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頁 290-313。
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說所反映的天命觀〉，收入周清澍，《元蒙史札》，頁 495-525。

孟繁清，〈內丘扁鵲廟的元代碑刻〉，收入方鐵、鄒建達主編，《中國蒙元史學術研討會暨方齡貴教授九十華誕慶祝會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頁 120-137。

孟繁清，〈唆魯禾帖尼中原漢地食邑考述〉，收入孟繁清等著，《蒙元時期環渤海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3，頁 306-325。

孟繁清，〈蒙元時期的顏氏三碑〉，《中國史研究》，2009：3（北京，2009.8），頁 168。

岡田英弘著，薄音湖譯，〈達延汗六萬戶的起源〉，《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85：2（呼和浩特，1985），頁 9-13。

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紀》譯釋（上）〉，收入邵循正，《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頁 19-65。

姚大力，〈“成吉思汗”，還是“成吉思合罕”──兼論《元朝秘史》的成書年代問題〉，收入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202-219。

洪金富，〈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臺北，2008.3），頁 1-40。

洪金富，〈唐妃娘娘阿吉剌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臺北，2008.3），頁 41-62。

洪金富，〈元代文獻攷釋與歷史研究──稱謂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4（臺北，2010.12），頁 737-767。

洪金富，〈忽必烈乳母的不揭之謎〉，《古今論衡》，21（臺北，2010.12），頁 31-62。

党寶海，〈李槃與劉秉忠文集〉，《元史論叢》，14（天津，2014.1），頁 320-326。

徐蘋芳，〈元大都也里可溫十字寺考〉，收入徐蘋芳，《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5，頁 459-467。

烏蘭，〈關於《元朝秘史》旁譯缺失的詞匯〉，收入聶鴻音、孫伯君編，《中國多文字時代的歷史文獻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363-387。

馬曉林，〈元代甘州十字寺唆魯禾帖尼影堂設立原因探析──兼論馬可．波羅所記河西景教〉，《國際漢學研究通訊》，8（北京，2014.3），頁 194-213。

馬曉林，〈元朝太廟演變考──以室次爲中心〉，《歷史研究》，2013：5（北京，2013.10），頁 67-82。

馬曉林，〈元代國家祭祀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許正弘，〈試論元代原廟的宗教體系與管理機關〉，《蒙藏季刊》，19：3（臺北，2010.9），頁 54-78。
陳高華，〈論竇默〉，收入陳高華，《元史研究新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頁 184-202。
陳高華，〈羅天益與《衛生寶鑑》〉，收入陳高華，《陳高華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 269-289。
陳得芝，〈八思巴初會忽必烈年代考〉，收入陳得芝，《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 315-332。
陳得芝，〈十三世紀以前的克烈王國〉，收入陳得芝，《蒙元史研究叢稿》，頁 201-232。
陳得芝，〈元嶺北行省建置考（上）〉，收入陳得芝，《蒙元史研究叢稿》，頁 113-136。
陳得芝，〈在紀念亦鄰真教授逝世十周年會上的發言〉，《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4（北京，2010.8），頁 21-22。
陳得芝，〈成吉思汗墓葬所在與蒙古早期歷史地理〉，收入陳得芝，《蒙元史與中華多元文化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155-182。
陳得芝，〈蒙元史研究中的歷史語言學問題〉，收入陳得芝，《蒙元史與中華多元文化論集》，頁 283-292。
陸峻嶺、何高濟，〈從窩闊台到蒙哥的蒙古宮廷鬥爭〉，收入何高濟、陸峻嶺著，《域外集──元史、中外關係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1-29。
楊富學，〈古代柯爾克孜人的宗教信仰〉，《西北民族研究》，1997：1（蘭州，1997.6），頁 130-137。
賈建飛，〈陶保廉與西北邊疆問題研究──以《辛卯侍行記》爲中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北京，2010.6），頁 122-128。
趙琦，〈《元史．許國禎傳》增補〉，《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6：1（呼和浩特，2004.1），頁 30-31。
劉光義，〈記蒙古莊聖皇后莎兒合黑塔泥事〉，《出版月刊》，2：1（臺北，1966），頁 57-59。
劉迎勝，〈元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波斯史籍〉，收入劉迎勝，《蒙元帝國與 13-15 世紀的世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頁 335-337。
劉迎勝，〈阿剌脫忽剌兀忽里臺大會考〉，收入劉迎勝，《蒙元帝國與 13-15 世紀的世界》，頁 3-14。

劉迎勝，〈元統二年收田事件研究──國家與貴族、寺院爭奪土地的背後〉，收入劉迎勝，《蒙元史考論》，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頁 427-483。

劉靜貞，〈蒙古帝國汗位帝系移轉過程中的三位女性──脫列哥那、莎兒合黑塔泥、海迷失〉，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二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183-202。

韓百詩著，耿升譯，〈謙河考〉，《蒙古學信息》，1991：1（呼和浩特，1991.3），頁 7-18。

韓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收入韓儒林，《穹廬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 388-436。

魏曙光，〈再論成吉思汗建國後的分封〉，《元史論叢》，14（天津，2014.1），頁 127-136。

魏曙光，〈阿兒渾覲見蒙哥之旅〉，《西北民族研究》，2011：3（蘭州，2013），頁 206-211。

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著，李文君譯，〈脫列哥那合敦是窩闊台的“六皇后”嗎？〉，《蒙古學信息》，2003：1（呼和浩特，2003.3），頁 19-24。

羅賢佑，〈元代畏兀兒亦都護譜系及其地位變遷〉，《民族研究》，1997：2（北京，1997.4），頁 70-80。

Rossabi, M., “Khubilai Khan and the Women in His Family,” in Wolfgang Bauer ed., *Studia Sino-Mongolica*, Weisbaden: Franz Steiner, 1979, pp. 153-180.

A Study on the Dates of the Mongol Princess Sorqaγtani Beki's Birth and Death and Other Relative Issues

Hsu, Cheng-hung*

Abstract

Sorqaγtani Beki, wife of Činggis Qan's fourth son Tolui,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Yuan Dynasty. However the problems with the dates of her birth and death remain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ome literature and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Sorqaγtani Beki was born in 1199 and died in 1252 when she was 54 years old. It also asserts that the age factor is significant to re-examine the life and deeds of the noble lady. In addition,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her death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oo.

Keywords: Sorqaγtani Beki, *Yüan shih*, *Ta'rikh-i jahan gush*, *Jami'al-tawarikh*, Tou mo, Yan tien-yi, spirit halls

* Ph D student,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